

MEMO 2017

《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MEMO

2017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30周年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30周年纪念册

2017年12月

MEMO2017

《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MEMO2017:《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3

ISBN 978-7-108-06237-6

I. ① M… II. ①生…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6888 号

责任编辑 赵庆丰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校对 张 睿 常高峰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9.25

字 数 453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十年前，美国《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报业的生与死》，探讨新媒体对报业的冲击。近几年，尤其是近一两年，新媒体对国内许多报刊造成的不仅仅是冲击，而是真正的生死体验。刚刚转过年，又有不少报纸宣布停办。对包括《三联生活周刊》在内的传统媒体而言，严冬不会轻易过去，而且还在加剧。不过，尽管不得不随时做出一些改变，《三联生活周刊》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办刊宗旨，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提供一个有深度的思考。尤其要向读者诸君表示感谢的是，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三联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不仅未出现断崖式崩塌，而且订阅量还稳中有升。

与此前各年一样，《Memo 2017》汇编《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重要报道而成。去年周刊制订了一个新的发展愿景，即聚合文化与生活，贯通中国与世界，具体就是“文化自信养成，生活方式提升，以全球为格局重塑价值观”，2017年，周刊就是在保持原有特色的情况下围绕着这一愿景布局的。2017年对我国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出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新区雄安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式伟大梦想，当然这一梦想要想实现也面临诸多的挑战；与此相应，北京的一些新规如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自然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作为一本以文化和生活为主旨的非政治性刊物，《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和解读意在从多角度提供思考，权供资鉴。也与刊物的风格和传统有关，财经也是刊物的重点栏目，有过多篇报道，分析了去杠杆时代资产配置状况，力求找准这一让人有些看不懂的时代的理财之

道。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期盼已久的好事，但是生育二孩会在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诸多问题，我们个人和国家、社会做好了准备了吗？

在国际方面，2017年同样是不平凡的一年。暴恐、难民事件仍在发酵，而特朗普出人意料获胜后执政第一年种种让人见怪不怪的政策，不仅影响到美国自身，也对中国、俄国和世界大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政策甚至可能对世界环境的治理带来动荡，尤其是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都去一线进行了采访，这些报道反映了周刊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动荡不安的世界还有多个热点，如叙利亚问题，停火已至，和平仍遥遥无期；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对欧洲的价值观和国家理念形成重大挑战。南亚既是我国的近邻，也是影响世界的一大因素，今年周刊重点关注了印度的转型。

2016年周刊特别关注了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李世石在围棋对奕中惨败给AlphaGo这一事件显现的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2017年继续对此予以关注，并重点讨论了未来医学和跨境医疗；介绍了人类对外星尤其是银河系和太阳系的新认识，关注了人类未来的命运。与此相关，周刊重点报道了中国人从何处来这一与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品《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无现金社会正在向我们大踏步走来，新零售格局初具；网剧正在逼迫中国影视业进行第二次变革。中国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世界将呈现什么样的新格局，让我们拭目以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编辑部

2017年12月

目 录

下一站，雄安：新区的梦想与挑战

雄安新区的多重使命	2
土地制度，深圳到雄安的探索轮回	10
新区的挑战	20
畿辅逻辑：河北省际政治经济学的演化	27

踏准财富节点：去杠杆时代的理财之道

去杠杆持续加码	38
去杠杆时代的资产配置	46
寻找 A 股中的“漂亮 50”	59

全面二孩：35 年独生子女时代结束

生育二孩：你准备好了吗？	68
二孩婴儿潮：被挑战的医疗资源	75
二孩养育成本，谁来与母亲共担？	89
这次迟来的婴儿潮，还能“喷”几年？	99

Memo more...

杭州保姆纵火案：消失的三小时	106
信任危机中的幼儿园：重建爱与安全	122
禁煤区：蓝天与煤、电、气的博弈	127
江歌案：三个留学生的命运交织	133
疏解北京，功能还是人口？	148

特朗普执政第一年

减税：对中国的影响	162
单边主义归来：特朗普的耶路撒冷棋局	167
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后	175
“通俄门”发酵，特朗普政府裂痕初现	183

这一次，印度转型？

莫迪与他的“第三印度”蓝图	196
印度经济的转型方式	202
谁为印度解渴？	208
印巴分治再审视	218

叙利亚 2017：战争与和平

停火已至，和平无期	230
现代叙利亚的缔造	241

Memo more...

夏洛茨维尔事件：种族主义的幽灵在美国游荡	258
抗议声中“普京模式”陷入慢性衰竭	265

马克龙：法国梦最后的机会 277

加泰罗尼亚：双输的赌博 288

中国人从哪里来？来自 DNA 的证据

解读生命之书 298

古人的遗言 319

身体与城市：未来医学

与微生物同行 348

“升糖”的城市 359

跨境医疗与产业之思 367

宇宙、科技与想象：未来考古学

银河系与太阳系，还有我们自身：

与未来一道而来的危险 386

人类，那些不可思议的创造以及代价 397

人工智能的刹车何时失灵？ 407

Memo more...

《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418

《摔跤吧！爸爸》：我们向印度电影学什么？ 428

中国网剧，撬动影视行业的第二次变革 437

新零售的机遇与挑战 449

“无现金社会”正大踏步而来 454

下一站，雄安：新区的梦想与挑战

正如它的名字，雄安，一个横空出世的地理概念，一跃成为“雄伟”和“安定”的象征。这一枚出人意料的棋子，是如何布下的，它又能否破解超级城市的困局？近乎一张白纸的雄安，能否绘上一幅壮阔雄伟的千年蓝图？

雄安新区的多重使命

贾冬婷

“北京”离开北京

如果说通州副中心迈出了“‘北京’离开北京”的第一步，雄安新区则是更加彻底的下一步。转移到通州的只是北京市部分行政功能，未来的雄安则要承载更广泛意义上的“非首都功能”疏解。

抛开各种权威排名，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永远是城市竞争力的直接感知者。据统计，2015年北京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3个小时，远超纽约、东京等城市；2016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3微克，超过国家标准109%；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47万元，较2015年上涨了17.2%。北京房价收入比超过30倍，学区房更是天价……这对个人幸福指数的拉低效应不言而喻，因此而“逃离北京”也有向各层面蔓延的趋势。引人关注的是，2017年“两会”期间几位中科院院士讨论的青年科技人才流失问题，在中科院工作的年轻人迫于买房、子女入学等现实压力离开北京的不乏其人，而这些人，原本是对北京的高端科研资源和国际交流环境有迫切需求的。

看上去，超级城市的“城市病”总是与它的规模相伴而生，因此传统的思路就是限制人口，防止“过大”。改革开放后，北京一直把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但这一目标却屡屡被现实击败。上一次2004版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最新统计的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173

万，同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2016年，北京采取了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增量，但是并不能改变未来人口反弹的趋势。

马里兰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丁成日用“水坝”来比喻北京人口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假设有一个100米的水坝，水库水面为50米，有一个闸门放水，大坝的泄水量好比流入北京的人口。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加大了城市间的差别，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在加大，这相当于水库的水面在不断地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极大地弱化了改革前城市人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结果已经无法通过直接的户籍制度来控制北京人口，转而提出“以屋管人”“以业管人”的间接措施，相当于放水的闸门在不断地松动，导致泄水量加大；而且，国家整体发展趋势也在不断释放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以户籍制度改革、高考移民门槛的松动、事业单位改革为代表，好比国家为了发展加大了闸门口径。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大坝的守护人员不准泄水，如何能够做得到呢？

北京这30年间进行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的理论依据之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即发展应该受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而城市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也认为，城市效用函数和城市规模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它取决于城市规模正反两个相应的相互对比。在现实中，正面效应主要是城市的集聚效应，负面效应则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经济集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最终，只有当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据此理论，在城市跨越最优规模拐点的时候，就应该去控制。

然而城市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最优规模”。事实上，如果把规模经济递增的因素考虑进去，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大伦敦”规划的操盘手、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学院教授彼得·霍尔指出，一种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正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出现。同样高度集权化的“超级首都”东京可以作为北京的一个参照

系。早在1946年，东京的城市设计者就开始担忧一个超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城市病——“集聚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对东京来说也并不新鲜。前后几版规划可见思路演变：一开始的做法是限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以绿带来限制都市蔓延，随后则是给城市扩容，建新城来疏解功能。直到1976年规划意识到了东京一极独大的问题，开始强调在都市圈内应该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各有分工但是又相对独立，此后的30多年这种“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一直是东京首都圈规划的原则，而最近几年“迁都”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而与亚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不同，这次设立雄安新区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迁都”，而是反向为之，让“北京”离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的首都功能，在2014年被确立为四大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并未提及经济中心。但是，与其他“超级首都”不同，特别是与那些后工业化城市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一直在事实上叠加在一起。由于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心城区的持续累积，多种功能在空间上抱团，形成了中心城区高密度、高强度的集聚格局。由此，北京既面临着类似发达国家首都城市的“功能转型”，也面临着类似发展中国家首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环境压力加大的双重挑战。

可以说，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最有效方案，就是形成一个强大的反磁力中心。在北京“世界城市”的雄心下，首都功能的叠加、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模式的转型，都一步步加强着它的虹吸作用。因此，亟待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雄安新区的内在动力。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为，过去北京的各种功能都像“滚刀肉”一样全搅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建卫星城还是新城，都还是在把“大饼”往外摊，城区的压力继续增加。“如同一个人变胖了，心脏的压力会恶化。现在要另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缓解心脏的压力。”

失衡的京津冀

事实上，将北京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框架下去考虑，从20世纪80年代

初期已经开始了，一度有渤海城市经济区、京津唐地区城市群、首都经济圈等多种表述。1999 年在北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院士吴良镛正式提出这一区域规划课题，以“大北京”为名。当时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大伦敦”“大巴黎”“大东京”的概念，但是北京对这个提法还是有点担心：“大北京”，是让北京去领导天津和河北？于是当时的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建议，划定一个区域范围，用“京津冀”的概念。

从历史上看，京津冀一体化顺理成章。京津冀地区古为幽燕、燕赵，历元明清三朝 800 余年本为一家，元属中书省，明为北直隶，清为直隶省，民国初北京为京兆，天津属直隶省，定都南京后北京与天津同属河北省。北京作为中国的权力与文化中心，要从 800 多年前元代建都开始。而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则拉开了周边城市群崛起的序幕。明清北京城的辖区比现在大，顺天府把天津和保定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北京是军事重镇，自身没有港口，临海的天津就成为卫城。这样一来，北京面山靠海，有充足的水源，有比较广阔的平地供建设，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虽然没有用“大北京”来命名，但一直以来，京津冀发展还是围绕北京展开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参与了 2004 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的制定，他认为，京津冀问题的核心，一是北京怎么发展，二是北京作为首都，要成为带动国家发展的龙头，只靠当时北京市域范围的 1.6 万平方公里、1000 多万人肯定不行，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腹地安排、更高的区域目标。

但是，与长三角区域上海单中心向外辐射不同，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地，长期以来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从人均 GDP 数据来看，2015 年，北京市的人均 GDP 是 10.6 万元；河北省是 4.2 万元，仅为北京的 40%；而雄安新区中的雄县，其人均 GDP 仅为 1.8 万元。从产业结构看，北京的第三产业比例占 80%；天津的第三产业占到 52%，仍保留了 47% 的第二产业；河北省的城镇化率仅为 51.33%，第一产业还占 12%。102 家央企中，81 家总部在北京；343 家国有重点企业中，65 家在北京，17 家在河北，5 家在天津。

“京津冀之间的落差是‘悬崖’式的。”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肖金成指出，北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

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河北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规模过小，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土地利用粗放，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建设资金筹集困难，社会服务设施也不完善。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对河北省北部贫困山区进行发展调研，肖金成也参与其中，他们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环首都贫困带”，即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论及成因，一是行政区隔，这些地区集中在河北靠近北京的地方，远离本省政治中心，而北京也没有辐射过去，成了边缘中的边缘；交通也不便，北京到承德、到张家口都是一条路，其他通村、通乡的路都是土路，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大多处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降水量低、风沙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低，单靠当地的农作物本身也无法让农民富起来。当然还有这些地区位于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这对当地发展也造成了一定制约，形成了典型的“灯下黑”现象。由此，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也使得北京的发展难以获得区域支撑：一方面制约了首都功能的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短缺、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等一系列问题。

肖金成曾对北京、天津和河北11个地级市做了一次全面考察，梳理了京津冀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一是京津两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强；二是京津有虹吸效应，把周边资源都吸引过来了，与河北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利于产业的转移，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三是三地产业结构趋同，存在恶性竞争的现象；四是行政阻隔，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五是生态环境受到很大影响，河北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不起来，主要发展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低，高耗能、高污染。

可以说，如果不能打破目前三个区域行政割裂的制度壁垒，京津冀一体化仍然是个乌托邦。肖金成说，2004年，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在廊坊召开了一个“2+8”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即北京、天津加河北8个地级市，共同推出了一个合作宣言——《廊坊共识》。其中列出了包括建立高层联席会议制度、联合设立协调机构、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在容易突破的领域开展

合作等近 10 项举措，拉开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序幕，但后来的落实并不好，因为两市一省、三个省级行政区，要达成一致意见不容易，急需更高层的介入。

吴唯佳说，2004 版城市总体规划出台之后的北京奥运会，为北京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打开了一个大门，当时也顺势在“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标准下，确定了一系列区域协同发展的方案。但遗憾的是，奥运会之后马上爆发了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些计划。“一时间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所谓实体经济上，各级政府关注的都是 GDP 指标，怎么能够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怎么建设更多的项目，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了，交通越来越恶化，空气越来越差，旧城越来越衰败。”直到 2014 年习近平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京津冀”议题才有了实质性突破。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里去疏解非首都功能，关键的问题是疏解什么，如何疏解。赵燕菁认为，以往那种把“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迁出去的疏解模式，不可能成功。“因为要素就像流水，流向何方，取决于哪里更低洼。由于中央政府的存在，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极大的落差，只要这个落差不缩小，经济要素涌入北京的总体趋势就难以改变。要让要素从北京流向周边地区，就必须创造一个比北京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

为什么是雄安？

尽管一直想要在河北找一个点，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但是，雄安的出炉仍然出乎意料。“雄安”是个全新的地理概念，它位于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中心位置，将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覆盖进去，又在“雄县”“安新”两地中各取一字而得名。

这一选址十分微妙。首先是雄安和北京之间的距离——它离北京足够近，100 公里距离在北京的可辐射范围内；它又离北京足够远，远到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快速蔓延的副产品，而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其次是雄安在京津冀区域的位置，它几乎在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地理中心，而并不过于靠近其中任何一个，这在一方面可以冲破坚硬的行政壁垒，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避免像以往新区一样被土

地财政绑架。

而放在更大范围内来看，雄安被期待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增长极。在中国几大区域经济中心中，位于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站在了经济发展的前列，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长期陷入互相掣肘的境地，协同发展没有大的进展。再加上东北地区的衰退，中国北方地区急需一剂强心剂。

雄安被定位为又一个国家级新区。对它的未来猜想，有必要去回望下之前的两个参照系——深圳和浦东。经济学者刘胜军分析，深圳奇迹、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深圳的崛起，源于其毗邻香港所带来的巨大势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境内境外差距巨大。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上最大的贸易口岸，不仅有最大的港口，还有为贸易口岸服务的成熟和丰富的现代服务业。深圳作为当时中国面向境外的唯一窗口，所裹挟的是全国的能量，那种优势是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所以后来的海南、厦门等经济特区，都难以取得深圳那样的飞跃式发展。刘胜军认为，如果说深圳是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那么浦东则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聚焦点。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不久，邓小平“南巡”，随即 1993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尤以上海为集中地。2013 年上海浦东新区发布《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浦东已集聚了 202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5 家研发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最集聚的地区，这也是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的战略考量。到了 2006 年，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同样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但第二轮改革已接近尾声，因此滨海新区并未取得浦东那么奇迹般的成就。

从市场角度看，雄安并没有当年的深圳、浦东那样的优势，甚至也比不上作为渤海湾出海口的滨海新区。雄安的潜力在于，它还没有既得利益的介入，是一张白纸，一块被顶层设计的改革试验田。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 2000 平方公里，超过北京六环以内的实际面积，超过深圳，与浦东相当，未来的拉动能力不可小觑。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预计未来 10 年至 20 年内，雄安人口将达 340 万至 670 万人，总体投资达 1.2 万亿至 2.4 万亿元人民币，每年拉动全国投资 0.15 至 0.63 个百分点。